

《四六灿花》考论^{*}

苗 氏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大批四六选本,据笔者初步统计,存世的尚有近五十种。但遗憾的是,这些选本中除了王志坚的《四六法海》由于收入《四库全书》得到了一些关注,其他的选本则几乎湮没无闻。本文在综合考察明末四六选本的基础上,选取《四六灿花》作为明代中后期四六选本的范本来加以讨论,希望能够借此引起学界对明代四六选本的更多关注。

一、《四六灿花》的版本与编撰

《四六灿花》十二卷,明张师绎选评、毛应翔诠释。此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皆有人藏,目前最易见的版本是故宫博物院藏明天启毛氏金陵刊本(以下简称故宫本),已收入海南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故宫珍本丛刊》第620册元明诗文总集,便于查找。遗憾的是,笔者目前尚未能亲睹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本(以下简称台图本)以及国外的藏本。所幸《“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以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已经为其藏本撰写了详细的书目提要,并且整理收录了其藏本卷首的三篇序跋。而由沈津先生编撰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也为哈佛燕京藏本《四六灿花》(以下简称哈佛本)撰写了详细的书目提要,故可以此为依据,对三种藏本进行一个初步的比较。

故宫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版心花口,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上方题“四六灿花”,中间记卷数,下方记页次。书中正文行间有圈点,书眉刻批语,文后有评语,有注释,刻写精美。前有序,次有凡例六则,次有目录。与台图本和哈佛本提要记载的情况相比较,此三种版本是否为同一底本尚不能完全肯定,但至少不是同一次刷印:台图本较故宫本在卷首多了两篇序,一篇在卜氏的序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四六选本及四六类书综合研究”(2012M52109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明代中后期骈文选本与骈文批评综合研究》”(13YJC751039)阶段性成果。

文之前,末署“偶然居士余大成书”;一篇在卜氏的序文之后,末署“天启癸亥正月上元,同邑友弟张师绎克隽父撰”。从张师绎作序的时间来看,这部选本刊刻时间不会早于天启癸亥(三年)。而据沈津先生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所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亦是天启刻本,其不同之处则在于卷前只有余大成的序,而没有卜履吉的序和张师绎的序^①。出现这种情况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此书经历过至少三次以上的刷印,在不同的刷印过程中造成了序跋的增删情况。

据余大成序中所言,“……有兰陵毛凤卿来客长干,与予邑卜介甫氏尽搜名作,爰汇斯编,颜曰四六灿花”^②云云,可知这本书的最初编选者为毛应翔和卜豫吉,而卜豫吉正是本书另一篇序文的作者卜履吉的弟弟。又据卜履吉序中所言,“今其选曰灿花,大半为梦泽兄所刊定”^③,可知此书选文的最终刊定者为张师绎。结合本书各卷卷首所列的编撰者名录来看,虽然这部只有十二卷的选本其相关编撰人员总计有四十六人之多,但核心编撰者实为毛应翔、卜豫吉、张师绎三人。

此三人中以张师绎名声最著。张师绎,字梦泽,武进人,万历进士,官至江西按察使,与当时名士汤显祖、董其昌等人皆有交往;毛应翔,字凤卿,其生平事迹罕见史籍记载,邹迪光文集中载有《与毛甥凤卿》及《与毛凤卿》书信两封,文中有言曰:“作文者刻,评文者亦刻,刻意为文,务去瑕而求瑜,刻意评文,乃即瑜而索瑕,两者政不相妨,吾甥定无罪我。”^④可知其为邹迪光^⑤的外甥;卜豫吉事迹亦罕载于史籍,万历时期金陵著名文人顾起元文集中收有一篇《卜介甫集序》,从中可略窥卜氏生平:“介甫家为金陵甲族……介甫才气,霞举云骞,足高一世,而涉览流略,该洽无遗,少与元器同著声簧序间,人谓其且继两先生而鹄起,乃抱璞未售,令时有翰墨之疑,岂大器之成固不易哉!”^⑥文中的“元器”是卜豫吉的从兄,也是顾起元的儿女亲家,“两先生”是指卜豫吉的叔父卜振甫与堂兄卜中立,此二人中前者与顾起元的父辈有交往,后者则是顾起元的同年进士。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卜家乃当时金陵望族,与顾家关系密切,卜豫吉虽少有文名,然科考不利,乃布衣之身。

①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591页。

②余大成:《四六灿花序》,《“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台北“国家”图书馆,1999年,第159页。

③卜履吉:《四六灿花序》,《故宫珍本丛刊》第62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

④邹迪光:《始青阁稿》卷二十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28、431页。

⑤邹迪光,字彦吉,号愚谷,无锡人,万历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官湖广提学副使,万历十七年罢归,在惠山下筑愚公谷,多与文士觞咏其间,工诗文,善画山水。

⑥顾起元:《雪堂随笔》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0册,第205页。

由此可见,《四六灿花》的核心编撰者都不是当时社会上声名显赫的人物,比起明代中后期其他一些四六选本的编选者如陆云龙、王志坚、朱锦、钟惺、谭元春、李日华等人,名气和声望都要小得多,但是以他们三人为核心的编撰队伍,却编撰出了一部称得上是明代最为精良的四六选本:“是刻校雠最力,绝无鲁鱼亥豕之讹。缮写更精殊,有铁划银钩之致,剗削既已逾常,赫号亦须踳直。”^①

其校雠之精严首先体现在卷首署名的校勘者数目方面。《四六灿花》各卷卷首列出此卷编撰的相关人士姓名,包括选评者(或称评选者)、诠释者、品定者、批阅者(或称较阅者)、参订者、编次者(或称论次者)、辑正者七类,分工精细,而且十二卷的编撰者除了选评者皆为张师绎、诠释者皆为毛应翔、品定者皆为卜豫吉外,其余从事校勘相关工作的批阅者、参订者、编次者、辑正者等四类人员,每卷都不相同。经统计,除了张、毛、卜这三位核心人物之外,此选本从事校勘相关工作的这四类人员另有四十三人之多,其中只有李邦铤、毛十翼二人曾在不同卷中重复出现过一次,其他的校勘者都只负责某一卷的某一项校勘工作。以如此大量的人力投入到一部只有十二卷的四六文选本校勘工作,在明代非常罕见。

其次还体现在对文章作者身份的严格核实方面。张师绎《凡例》有云:

鱼腹夙多贗物,捉刀每着床头,而鸿篇出之巨手,全集载其高文,固自班班可考,乃坊间冒甲以乙,惑人耳目,批阅几为齿冷。兹选既无取已陈之刍狗,又何假当场之叔敖,悉为改正。间有一二仍沿,殆无从核实,非有意随声。

四六作为一种广泛用于应酬交际的文字,主要是起到一种互通有无的礼仪性作用,其装饰性要高于实用性,因而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当事人自己亲自撰写,而可以由人代写,尤其是在官场各部门,这种代写甚至是一种常态,所以很多署名为名士的四六文,其实并非本人所写。但是一些四六选本的编撰者利用社会上盲目崇拜名士的风气,往往或有意或无意地将这些四六文视作诸名士之作,以使其选本更加畅销。《四六灿花》的编撰者有鉴于“坊间冒甲以乙,惑人耳目”这种不良习气,对所选录的四六文作者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核实。从目录中可以看出,凡是出自他人代笔的文章,皆直署代笔者之名,并在名字下方标一“代”字,以示此文之真正撰写者。这种一丝不苟、不流于俗的态度,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明代中后期图书出版业异常发达,一大特色就是出现了很多私人出版机构,这些机构出于降低成本、牟取更多利润、追求短期效益等各个方面的考虑,在书本刊刻上往往出现东拼西凑、校勘马虎、滥用名士头衔加以炒作等弊病,

^①张师绎:《四六灿花凡例》,《故宫珍本丛刊》第62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

后世文人颇多诟厉。在这样的风气下,《四六灿花》的编撰者们能够坚持精校精刻的原则,重视书本刊刻的质量,着实难能可贵。

二、《四六灿花》作为四六选本的一般文献价值

《四六灿花》作为明代中后期一部质量较高的四六选本,其选文视角之独到、编选态度之严格,都使其具备了较高的文献价值。

(一)按具体用途划分文类,发挥四六选本的类书功能。

《四六灿花·凡例》言:“四六之用,上自金门紫闼,下迄冷局散官,邕彼我之怀,申庆吊之惻,均所必藉,非珠玉筐篋而假为先资,非诗赋记序而用以行远”,道出了四六的广泛用途,正因如此,明代中后期四六选本“作实繁矣,选几滥焉”。正如同时期另一部四六选本《车书楼汇辑皇明四六丛珠·序》所言:“微但大者庆贺谢覆,聘享通讯,各皆有式,当酌左准,即如日用居间或应酬答问尺牍寸楮亦有不容忽视者”^①,包括《四六灿花》在内的很多四六选本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四六写作提供一种范式、一种便于查考和模仿的套路。

明代中后期的四六选本,大多数只选启体,在文章的分类方式上则按照启在不同领域的具体用途来分类;也有极少数四六选本所选不限于启体,如李天麟的《词致录》,其分类方式就是先按体划分再按用途划分。此外还有一种按体划分的分类方式,与前两类在选文宗旨上有所不同,不强调供人查考借鉴的类书性价值,而更注重文体自身的流变,王志坚《四六法海》、张应泰《古今四六古集七卷今集六卷》即为此类。

《四六灿花》的分类方式最为常见,所收四六文仅限启体,在选文体例上按具体用途划分。这种分类方法,为读者查考借鉴提供了便利,在什么样的行文关系中用什么样的行文方式和表达方法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只要翻阅此选本,便可很方便地找到借鉴对象,其意图恰如《凡例》中所言:“爵秩崇卑,列眉灿若,官方内外,指掌了然,事必备体,署无遗篇,人所略而我必详,彼或疑而此无漏,凡我同调,幸鉴苦心。”但这样的选文宗旨遭到四库馆臣的批判,如当时的另一部与《四六灿花》有类似选文宗旨的四六选本——李国祥《古今濡削选章》,《四库全书总目》评之曰:“是书选录四六书启,以官制为类,每类之首载官制考一篇,所选上起六朝,下迄宋明,而宋明尤详,国祥及其弟鼎作亦附焉。大抵为应酬而作,其体则总集,其实则类书也。”^②这种“大抵为应酬而作,其体则总集其实则类书也”的宗旨其实正是明代中后期大多数四六选本的共同特点。

(二)为考察明代各阶层礼俗活动及礼仪制度提供第一手资料。

①朱之蕃:《四六丛珠序》,许以忠《车书楼汇辑皇明四六丛珠》卷前,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30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52页。

在中国古代社会环境中,礼与法相辅相成,支撑着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系统。在很多时候,“礼”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统治方面都起着比法更重要的作用。而四六的存在,归根结底也正是中国古代复杂甚至琐细的礼乐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四六从诞生之初,在文体上就显示出有利于展示礼节的特性,使其理所当然地具备了礼仪性的特征。如钟惺《四六类函序》所云:“双声叠韵,聊展其恭敬之忱;合璧连珠,爰立其端严之体。又事君使臣朋友相遗,礼文之不可废者也。故诰表笺启至今用之。”四六的“双声叠韵”,能够展现“恭敬之忱”;其“合璧连珠”,能够昭显“端严之体”。故而无论是君臣应答之诰表,还是朋友往来之书启,都难以拒绝四六文体的魅力。这种风气自宋代就已经开始兴盛,所谓“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有专门”^①。正道出了四六启在人际交往礼仪规范中的重要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以《四六灿花》为代表的明代四六选本,保存了明代乃至前代的诸多优秀四六文,正可以为考察明代各阶层礼俗活动及礼仪制度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其进行考察和探讨,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还原明代各阶层礼仪关系的基本面貌。

《四六灿花》从分类方式上看,就考虑到了礼仪制度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特征。《四六灿花》所收的四六文仅限于启体,在选文体例上按文章应用的具体领域来划分:一卷宗藩(宗人府附);二卷内阁;三卷官僚(史馆附)、吏部;四卷户部、礼部(贡举附);五卷兵部、刑部、工部;六卷都察院、通政司、太常、光禄、太仆、鸿胪、尚宝、六科、中书、行人、国子监、京兆、司城、武学;七卷抚台、各察院;八卷藩臬;九卷郡县(学博附);十卷勋戚、武职(中官附);十一卷婚姻;十二卷杂用。

如张师绎《凡例》所言:“爵秩崇卑,列眉灿若,官方内外,指掌了然。”读者阅读是书所选四六,便可以直观地了解在哪些具体人际关系中会应用到四六文的何种交际功能,从而进一步对社会各阶层关系中主客体之间的尊卑礼节有全面的认识。

(三)考察文人交游关系和文人群体集团的形成。

以《四六灿花》为代表的明代中后期大批四六选本中收录了当时很多著名文人的四六书启,由于书启在封建时代的文体价值序列中属于较为靠后的一种,在明代亦是如此,所以这些四六书启除了少数具备审美娱情特质,而被编入一些著名的小品选集和尺牍别集中得以广为流传外,大多都只在当时如《四六灿花》为代表的一些四六选本中才得以保存。而由于书启是文人之间一种体现交游关系的特殊文体,所以对书启内容以及书启通信双方的考察,便能为了解明代中后期文人交游关系和文人集团形成过程提供一个极佳的切入

^①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四六标准》,中华书局1997年,第2165页。

点。如文人和宗藩的交往情况、布衣和官员的交往情况、中下层文人和上层官员的交往情况,这些在四六选本中都有很直观的反映。以《四六灿花》所收录四六书启为例,其中便不乏徐渭、王世贞、吴国伦、唐顺之、屠隆、焦竑、汤显祖、钟惺等著名文人的书启,这些书启资料的搜集和勾勒,能够为研究当时的文人交游提供第一手资料,但由于它们零散地分布在诸多四六选本中,因而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未引起注意。

三、《四六灿花》的特殊文献价值

就其在编选上的独特性而言,《四六灿花》又具备了一些其他四六选本所没有的特殊文献价值。

(一)注重选录军事题材的四六,为后世考察明代中后期军事状况保存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同时有助于后人了解四六文在军事领域的独特功能。

《四六灿花》在选文上的一大特色是选录了大量军事题材的文章。明嘉靖以后,政治统治渐趋腐朽,边疆战乱愈发频繁,这些不能不引起知识阶层的重视。在这个背景下,《四六灿花》编选者对军事题材类四六文的大量收录,并非偶然,而正体现出他们对明朝军事的种种忧虑,因而希望通过选录这类文章提高社会大众的军事忧患意识。卷前张师绎《凡例》云:

烽烟未靖,戎马纷驰,豪杰枕戈,书生投笔,共疑当废此毛锥,我曰不遗夫书记,凡属兵事,无不采摭,旁逮兜鍪,一皆荟辑,文章有用,辞命多奇,介胄借之前筹,缙绅恃为衮甲,盖寓羽书飞檄之需,爰备露布铙歌之用云尔。

“凡属兵事,无不采摭”的选文态度与“介胄借之前筹,缙绅恃为衮甲,盖寓羽书飞檄之需,爰备露布铙歌之用”的选文理念,显示出编选者选文不仅仅是为了供人检索参考的类书之用,而更有一种关注社会现实的事功心态。阐扬经世致用的思想,并在选本中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这在古文选本中很常见,在四六选本中却罕有。如前所述,当时很大一批四六选本只是“大抵为应酬而做,其体则总集,其实则类书也”,并没有干预社会现实的自觉意识,自然不会如《四六灿花》一样通过选文的取舍来表达选者对社会现实的某种褒贬态度,并通过文章评点将这种态度传达给读者,以期产生某种社会影响。这种社会责任感是明代其他四六选本中所罕见的,堪称这部选本的独到之处。

观书中所选之军事类四六文,涉及平倭、镇蜀、征苗、破虏等东西南北各路战事,而张师绎的评点亦多与选文相得益彰。如卷五万世德《贺张职方》“蛮夷戎狄,将慴其声名;都鄙封疆,尽归于经理。业已邕九州之治,岂直树一台之华。”眉批曰“此才是职方,恨篇中尚少”,显露出选评者渴望军事将领都能尽忠职守、保卫边疆的心态。卷七马朴《贺总督三边魏》“恭闻光膺纶綍,总制阊戎。赐环远下东山,人望起一时之柱石;授钺即临西土,军声壮四镇之干城。社稷攸宁,海宇胥庆。窃惟黠虏为君父忧,二三载宵衣而吁食;实由重臣误国家事,十数年讳疾而养痍。始恃款而尽撤其防,及解盟而莫为之备。逮夫燃眉已

急,则不恤捐中国之大体,温辞厚赂以结和;即或息肩可图,亦尚掎制外夷之虚名,罔上偷安而讳战。使贼之骄心愈肆,驻久不归;致我以奔命益疲,忧深叵测。”眉批曰:“先叙起用,即接边事,慷慨忧时,借前箸以效筹,聚米山而料敌,时事可涕,谁能发药,痼疾膏肓,安得九还丹耶?”此文以散行单句为四六,有北宋欧苏诸子之风,语言很有感染力,选评者的评语也正是有感而发,表达出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忧虑。卷十宋尧俞《贺蓟镇总兵破虏》“夫蓟辽之镇,濒山海而控东胡,倚险阻而临朔漠,京畿左辅,陵寝后藩。顷因孽虏跳梁,遂至边城飞燧。不加惩创,曷杜窥觐。”眉批曰“由今视昔,可为痛哭流涕,全辽已成瓯脱,邦畿危如累卵,安得壮士直抵黄龙府耶?”表现出选评者对边疆安全的忧心。值得一提的是,这部选本中其他诸种用途的选文里很少就文中内容借题发挥的评语,而主要是对句法、用字、用典等偏重写作技巧和审美感受的点评,从这点来看,此类评语更凸显出选评者对明代中后期军事隐患的深切忧虑。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四六书启本身的体式体貌所限,因而所收的军事类四六启也不乏阿谀奉承之作,如卷十中宋尧俞的《贺蓟镇总兵破虏》、《贺萧总戎到任》等文中多有“功高旷古,事绝当今”、“人中龙虎,阁中麒麟”之类的谀夸之词,在某种程度上不免冲淡了《四六灿花》编选者的用世之心,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二) 作为明代现存四六选本中唯一附带系统性评点方式的选本,《四六灿花》创造性地发掘了四六文在文学审美愉悦性上的特质。

明代中后期是一个评点本盛行的时期,诗歌、小说、戏曲等文类自不待言,就是文章领域,也有很多古文选本为评点本,如钟惺辑评的《汉文归》,张运泰、余元熹编选的《汉魏名文乘》,刘士麟辑评的《明文霁》等等。但是,在四六选本领域评点本似乎并不兴盛。从存世的四六选本来看,其中的评点本为数寥寥,大多数的四六选本只是在每篇选文的文末对文中出现的典故做注释,以利于读者理解和使用这些典故,有些比较粗糙的选本甚至连注释都没有。就笔者所见的四六选本来看,只有《四六灿花》和冯梦祯等评选的《四六徽音集》(十六卷,明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及陆云龙的《四六俪》(二卷,明崇祯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这三部四六选本带有评点,三者评点风格各有特色,然若就文章评点的系统性而言,则首推《四六灿花》。试以《四六灿花》中一篇选文为例,来一窥其评点文章的特色:

答蒋户部(眉批:清品)

俞彦

琅函载至,春回佳丽之乡。宝历爰初,庆溢清华之署。(眉批:芳芬齿颊)阳出三而成泰,福钦五以备畴。(眉批:典以则)遥知茵鼎之调,正是提贞之候。垂情鸟爱,远赉鸿仪,云霞披琬琰之文,冰雪拟琼瑶之色。(眉批:清藻霏微)非敢后也,忽承一顰一笑之余;受言藏之,乃在三沐三熏之后。望使星而徒增菀结,依卿月而莫既敷宣。(眉批: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评：一往谈谈许，而瞳眈弥宣，昭晰互进，烨乎山媚川辉。

注：阳出三：初春为三阳开泰。福钦五：洪范五福

从这篇选文可以看出，《张梦泽评选四六灿花》的评点颇具体系，书中除极少数选文外，包括这篇《答蒋户部》在内的大部分选文的评点都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首先，在篇首以眉批标明此文之品第，所用之评语有能品、妙品、佳品、奇品、逸品、仙品、清品、神品、高品、具品、小品等等，与中国古代画品、曲品类评语类似；其次，于篇中以眉批形式评点语句之佳处、行文线索之妙处；最后，每篇文末有一两句总评，多用比喻性或者象征性的语句，突出一种纯粹的情感愉悦和审美联想。此外，如其他很多四六选本一样，此选在文后亦附有注释，对篇中所用之事典、语典做简单注释，方便读者理解。注释以双行小字形式呈现。这样的选本就不仅仅能够被读者当成写作四六的参考书来使用，更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价值和文学鉴赏价值。

《四六灿花》颇为系统的评点方式，显然是选评者在借鉴其他文类的评点方式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结果，作为明代中后期各类评点本中罕见的四六评点本，《四六灿花》具有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应当引起文章学研究者的重视。

（三）收录文章限有明一代，其选文基本上反映了明代四六文创作的最高水平。

在中国古代骈文史上，明代骈文的成就总体来说评价较低。金瓶香在其《骈文概论》中曾论及：“有明骈文，疏疏落落，皆无关于取法，其文集存于今者，不下千余种，所谓名篇巨制，毋论汉唐，且两宋之不若。最漏者，属对虽工，措辞近俳，甚至以卦名对卦名，以干支配干支，立定间架，几同刻板，至官场尺牍，斋醮青词，肤廓陈滥，千手一律，其佳者亦仅资谀颂已耳，复何奇哉？”^①这里所指出的“肤廓陈滥，千手一律，其佳者亦仅资谀颂已耳”，正是明代四六文一个较大的弊病，关于这一点，明人自己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如徐龙在《今古四六汇编序》中所言：

国家二百年来风气日宣，人文日朗，荐绅士大夫浸浸逼古，莫不接轸而修尺素。作者逞逞以为尺牍工于唐，四六工于宋，不知炉以今古，铸以名物，煽以风流，迄于今驾唐轶宋，譬之春华甫茂缤纷，茱萸葳蕤夺目，又可谓夺一时之胜也。然而酬答相沿，雕镂判铍，诡恢谲怪，剽窃影响，素杂中黄，江河趋靡，盛所以为衰，殊非雅道之所尚也。^①

这一段在指出明代四六“夺一时之胜”的盛况之后，指出其“酬答相沿，雕镂判铍，诡恢谲怪，剽窃影响”的弊病。“酬答相沿”言其应用之俗滥，“雕镂判铍”言其语句之雕琢，“诡恢谲怪”言其文风之诡譎，“剽窃影响”言其文意之

^①金瓶香：《骈文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9页。

陈陈相因。正是由于这几个弊病,明人四六文写作虽然极盛,但后人对其评价并不高。但值得强调的是,明人并不因本朝四六的诸多弊端而自惭形秽,而是积极地思考对策来努力纠正上述这些弊端。其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通过四六选本选取本朝的优质四六文,为明人四六写作设立典范。

从选文的时段性上来看,明代的四六选本分为三种:一种是通代式的,选取的文章自六朝至明朝历代皆有,如李国祥辑《古今濡削选章》,谭元春辑、马世奇评释《简远堂辑选名公四六金声》,游之光辑《今古四六汇编十卷》等;第二种是只选明代以前的,如李天麟《词致录》,胡松《四六菁华》,连标选、张寿鹏编《四六藻语》等;第三种是只选明朝的,如李日华《四六类编》,许以忠选、王世茂注《车书楼选注当代名公四六天花》,张师绎选评、毛应翔诠释《四六灿花》等。其中第三类是最多的,也就是说,明人的四六选本更多的是选本朝人的文章,这也许有本朝文章更便于模仿借鉴的考虑,但如此多的四六选本至少表明了明代有足够多的优质四六文可以被拿来作为写作的范例。

而在选取佳篇并通过评点来展现明人四六文的优点方面,《四六灿花》无疑是较为出色的,为后人正确认识明人四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评点之高妙,前文已有所论述,而其收录文章之精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选辑文体的完备,“事必备体,署无遗篇,人所略而我必详,彼或疑而此无漏,凡我同调,幸鉴苦心。”^②可以看出编选者有明确的文献意识,力求每一种用途的四六文皆有所收集,以备读者全面了解四六文的广泛用途。其次是筛选文章过程的精细,如张师绎在《四六灿花》序言中写道:“余友毛凤卿,古今文词无所不妙,乃于此道旁耆之,又精为之。岂维精为之,又严汰其中洒而部分之。岂为严择之,又搜五车之载,订三篋之亡诠释之。”最后是选文标准的严格:“是刻悉启名公之篋藏,仍求巨眼之鉴定。恍灵蛇之宝初腾,光堪照乘;如荆山之辉乍剖,价足连城。”

正是因为有这样严格的选文方式,《四六灿花》收录了诸多文辞并茂、可堪传世的四六文。而且,由于其不拘一格的选文态度,《四六灿花》不仅收录了王世贞、徐渭、唐顺之、汤显祖等大家的四六文,也选取了很多无名文人的四六文,因而该选本在作者数量上相对其他选本明显要多,不仅使很多无名文人作品得以传世,也给后人展现了明代四六创作的兴盛景象。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徐龙:《今古四六汇编序》,游之光《今古四六汇编》卷前,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②张师绎:《四六灿花凡例》。